



Diyu Jituan
yu Nanchao
Zhengzhi

章义和 著

地域集团与 南朝政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章义和 著

地域集团与 南朝政治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DIYU JITUAN
YU NANCHAO
ZHENGZH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域集团与南朝政治/章义和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9

ISBN 7-5617-3064-0

I. 地... II. 章... III. 政治—研究—中国—南朝时代 IV.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7287 号

华东师范大学教材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地域集团与南朝政治

编 著 章义和

责任编辑 姜汉椿

封面设计 黄惠敏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http://www.ecnupress.com.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7.125

插 页 5

字 数 205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一版

2002 年 9 月第一次

印 数 01-2100

书 号 ISBN 7-5617-3064-0 / K·224

定 价 19.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章义和 1963年6月生,安徽青阳人。1987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主要著作有《六朝史稿》(合著)、《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僧佑传》、《神会传》、《中华姓氏谱·赵》等,并在海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

引 言

中国历史进入封建社会以后,血缘关系与地域因素交织在一起所形成的宗法地域性,对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活跃于西汉的地主世家,就是这种宗法地域性的具体体现,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演变为中国历史上特有的门阀世族。总体上看,秦汉乃至西晋,国家政权大多由具有宗法地域特征的集团作为支撑性力量。地域集团力量的浮沉升降,往往关联着当时复杂的政局,甚至成为政权更迭的关键因素。延及东晋,出现了皇权政治的变态即世族政治^①。在这种政治形态下,统治集团中的血缘因素重于地域因素,世族集团与皇权“共天下”,支撑着偏安一隅的江左政权。而在继起的南朝,封建政治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南朝的政治形态,是东晋世族政治向隋唐皇权政治复归的过渡形态。这种复归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具有了新的历史内涵。其突出之处在于,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统治集团的力量格局由一元转变为多元。一方面,持续了百余年的世族政治余威尚存,以历史惯性发挥着较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世族以外的各种政治力量竞相登场,以各种形式活跃于江左政治中。东晋时期,在复杂的民族矛盾背景下,拥有强大社会影响力的世族集团与仅具精神号召力的皇统相依相存于政局,而南朝则是由各种利益集团在皇权下共同地发挥政治作用。其中,

^① 关于东晋时期的政治形态,国内外学者原无一定的界定,或称门阀政治,或谓贵族政治。田余庆先生说,门阀政治,即士族政治,质言之,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于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详见《东晋门阀政治》自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我同意田先生的这一观点,惟强调“世族政治”,因为大族政治的特征之一,在于权力的世袭性。

具有地域色彩的政治、军事力量即地域集团是南朝政权的支撑性力量。它与东晋传承下来的世族政治及新政权下的皇族政治、寒族政治等相结合,构成了南朝政治的典型特征。而且,因历史条件的不同,地域集团的形成、发展在南朝各代及其不同时期,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性。多个地域集团并存、交织及其活动,在为南朝政治增添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同时,也带来了种种不确定性。地域集团与政治权力的组合变化,不仅作用于时政,亦对隋唐的政治形态产生影响,体现出中国古代政治形态具有连续中渐变的特点。因此,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南朝的历史真实,就不能不将地域集团作为关注的重点之一。

地域集团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关系,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学术界相当重视的研究课题,其中对南朝地域集团以及诸地域集团与南朝政治之关系的研究,亦有不少成果出现。需要说明的是,对地域集团与南朝政治在一定规模上的深入探究虽是近二十年来的事,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始于陈寅恪先生。在《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中,陈先生指出:“南朝之政治史概括言之,乃北人中善战之武装寒族为君主领袖,而北人中不善战之文化高门,为公卿辅佐。互相利用,以成此江左数百年北人统治之世局也^①。”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中,他更进一步分析了晋末以来的社会变动,认为南朝的政治格局与地域集团的力量消长密切相关,宋、齐、梁三朝霸业的建成大多依赖于江左北人之武力集团,但到了梁武帝统治时,“此集团之武力已不足用,故梁武不得已而改用北来降将。至陈霸先则又别用南方土著之豪族,此为江左三百年政治社会上之大变动”^②。陈先生探赜索隐,阐微抉疑,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中把握南朝政治的特征,开创了地域集团研究的崭新领域,给后昆以垂范。此后,陆续有学者致力于此。如唐长孺先生考察了青齐地区的武力集团,指出:“南北朝的时期,

① 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1 本第 1 分册,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② 载《中山大学学报》1956 年第 1 期,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青齐地区是豪强武装纵横之地^①。”田余庆先生曾对东晋时期以京口为中心的北府兵作了详尽的考察,认为:“北府兵日衰,荆雍兵日甚,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②。”近年来,还有许多学者诸如陈国灿、杨德炳、方北辰、孙继民、冻国栋、罗新、何德章、韩树峰、张琳等先生,对地域集团问题进行了富有意义的探讨。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对此问题所作的努力。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谷川道雄先生提出了“豪族共同体”这一概念,其表述是:“六朝豪族,一方面为直接的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对于该地域之编户而言,可以说是间接的土地所有者。这种以豪族为中心之地域再生产构造的全体,我们称之为‘豪族共同体’^③。”简单地说,以望族为中心所形成的血缘和地缘的社会集团,便是豪族共同体。80年代,谷川先生对其学说作了进一步发挥,在讨论六朝国家的形成和地域社会时说道:“新王朝在取代纲纪废弛的现王朝时,必需以有紧密连带关系的集团,为其权力的中核。宋、齐、梁的王朝,乃是由北方移住而成的地域集团,来发挥作用。不用说,统率这些地域集团的,乃是同乡的豪族^④。”尽管我们对豪族的概念和认识与谷川先生有所不同,但不能否认“共同体”一说对我们的启发意义,那就是大族崛起并日益成为地域社会的核心,大族与地域社会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支配权力,进而影响了六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方方面面。谷川氏之外,安田二郎、中村圭尔等先生在此领域亦下力颇多。

已有的研究成果固然令人欣喜,却也存在着不少有待弥补的不足。陈寅恪先生重视宏观把握,见识高迈,但未能细化。田余庆先生在研究中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论述精妙,但仅止于东晋,对南朝则未加探讨。而其他的研究者均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缺失。学者们大多专注于一个地域集团的变迁,分别立论,虽然精彩,却显得单薄,尤其是对同一地域集

① 唐长孺:《北魏的青齐土民》,见《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 田余庆:《北府兵始末》,见《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③④ 谷川道雄主编:《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第6页,第18页,日本玄文社1989年版。

团在不同历史时期发展的差异,以及同一时期不同地域集团的交叉、冲突等少有措意。因此,还难以反映出南朝地域集团的全貌。

针对这一现状,本书欲在前辈和时贤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各类史料的排比和分析,将精力专注于南朝时期各地域集团兴衰的历史逻辑及其与诸朝政治的远近关系,透过这一视角,加深对南朝政治的理解,以求更为准确地把握这一时段的历史特征。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晋末宋初的京口集团	1
一 京口集团的形成	1
二 东晋后期京口集团权力的转移	5
三 京口集团的重振与刘裕建宋	8
四 京口集团的消陨	15
五 京口集团的变动与刘宋政局	19
第二章 青徐集团始末	23
一 青徐集团的主要构成	24
二 刘裕攻灭南燕与青徐集团的变动	28
三 青徐集团与刘宋前期政治	33
四 孝武时期的青徐集团	40
五 青徐集团与“义嘉之乱”	45
六 刘宋丧失淮北与青徐集团的动向	52
七 青徐集团与宋齐易代	57
第三章 雍州集团的变迁	61
一 雍秦流民与雍州集团	61
二 晋宋之际的雍州集团	65
三 雍州集团与元嘉政治	67
四 孝武继位及雍州集团的强盛	73

五 刘宋后期雍州集团的中挫	78
六 雍州集团与萧衍建梁	80
第四章 荆州势力的兴衰与南朝政治	86
一 “委荆以阃外”与江陵畏襄阳	86
二 荆州大族的兴衰隆替	97
三 从还都之议看荆州势力	101
第五章 江东集团与南朝政治	115
一 江东集团的结构	115
二 两晋时期江东集团的际遇	119
三 刘宋时期江东集团的应变	122
四 萧齐时期江东集团的惨淡经营	134
五 梁陈时期江东集团作用政治方式的改变	139
第六章 论江州	151
一 江州辖境的变化	151
二 晋末刘裕处置江州的方略	153
三 刘宋之江州	158
四 萧齐时期江州影响力的强弱	164
五 梁对江州的控制	169
六 从功臣刺州到宗王出镇——陈朝处置江州的两个 阶段	175

第七章 梁陈之际统治阶层的变动及陈朝政权的

支撑力问题	180
一 梁末统治集团的阶层转换和区域转换	181
二 陈朝初年政权支撑力的构成	190
三 对文帝朝地方动乱和宣帝朝权力中心的分析	201
结 语	208
主要参考书目	212
后 记	215

第一章 晋末宋初的京口集团

东晋末期,世族与皇权共治的政治格局出现了重大的裂痕,渐向皇权政治复归。在复归的过程中,各种政治力量竞相登场。其中,带有强烈地域色彩的政治、军事集团即地域集团,作为晋末宋初政权的支撑性力量,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多个地域集团并存,彼此错杂交织,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发展各有差异,是此期地域集团的典型特征。总体上看,东晋末至刘宋初期的支撑性力量是京口集团,刘宋中后期则为雍州集团所代替。同时,其他的地域集团如青徐集团、荆州集团、江东集团等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当时政治。本章以京口集团为讨论对象,以勾画晋末宋初政治变动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京口集团的形成,始于东晋成帝初郗鉴移镇京口,其力量的主要来源是永嘉乱后南迁的北方流民。东晋后期,京口集团中衰。刘裕以京口、晋陵地区的流民为基础,重振京口集团,并以其为主要的军事力量,内征外讨,完成了覆晋建宋的大业。刘宋前期,京口集团的势力由中央扩散到重要的藩镇,参与重大的政治活动,其力量的兴衰较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格局。随着京口重镇地位的丧失、流民来源的枯竭、京口主将的死亡以及其他方镇的兴起,京口集团逐渐衰落。刘宋中后期,已很难寻觅京口集团的踪迹。

一 京口集团的形成

京口集团的形成,始于东晋成帝咸和初年,以北府名将、徐州刺史

郗鉴由广陵移镇京口为标志^①。

西晋永嘉之乱以后,北方人士大量南迁,仅就长江下游而言,“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②。洛阳陷落后,“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③。东晋年间,大规模的移民还发生过两次^④。依据史书的记载,这些南迁过江者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西晋的宗室、文武大臣及世家大族,他们往往沿淮、泗南下,经广陵渡江至京口,聚集在建康周围。《太平御览》卷一七〇“升州”条引《建康图》:“西晋乱,元帝自广陵渡江。”《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亦称:“晋乱,琅邪国人随元帝过江千余户,太兴三年,立怀德县。”这些大族属于南迁众流中的上层,他们是司马睿建立东晋的柱石。对此,陈寅恪先生曾有过评述:“东晋元帝者,南来北人集团之领袖”^⑤。所谓“南来北人集团”,便是指麇集在建康周围的上层集团,按照我们旧有的称呼,即指西晋时有身份的人士。

第二类为长江以北的下层民众,他们地位卑下,势力单薄,南迁人数亦较少,南迁者大多分散杂居于吴人势力较甚的区域,难以形成强有

① 京口古城,故址在今江苏镇江,据《舆地纪胜》卷7“镇江府”引《徐州记》曰:“京口,旧名须口。”又《太平寰宇记》卷89“丹徒县”引山谦之《南徐州记》曰:“京口,旧名项口。”东汉末、三国时称为京城,东晋、南朝时,因为此城凭山临海,通称京口城。京口地位的彰显始于东汉末年。汉献帝兴平二年(195),转战江东的孙策曾派遣将军孙何“领兵屯京地”(《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一》“润州”条引《吴志》)。建安十三年(208),孙权定都于京口城,并在此指挥了著名的赤壁之战(《太平寰宇记》卷89《江南东道》“润州”条作建安十四年)。孙权迁都建业以后,京口的重要性相对减弱。自东晋至刘宋,随着京口集团势力的形成和发展,京口成为牵动当时政局的重镇。“晋人谓京口为北府”(《资治通鉴》卷104《晋纪二十六》“孝武帝太元二年”胡三省注),聚集于京口地区的势力,晋宋时多以北府习称。其势力覆盖江南的京口、晋陵一带,甚至还包括江北的广陵。下文所论,并不局限于京口一地的变迁,而在于考察以京口为核心的武力集团即京口集团的运行轨迹。

② 《宋书》卷35《州郡志一》。

③ 《晋书》卷65《王导传》。

④ 一次为太宁三年至永和五年(325—349);另一次为宁康元年至南朝宋永初二年(373—421)。

⑤ 《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见《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力的集团,并逐渐同化于土著。

第三类则为寒族,即陈寅恪先生所称“次等土族”,大多集居于京口晋陵一带。此一人群是下文所要考察的重点。

另外,南迁众流中还有不少人不得过江或者不愿过江,这些人“多是统率宗族乡党,千百为群的流民帅”^①。这些流民帅与东晋司马氏政权的关系颇为复杂。就流民帅而言,他们虽然欲攀援东晋政权以求在新的空间里继续发展,同时又因拥有一定的势力,不愿受到司马氏的过多节制,故多驻于江淮之间。从司马氏角度来说,新朝局势的稳定需要借重流民帅的力量,却又恐这些势力过江后危及江左政权。双方相依相忌的情状所演化的结果是,司马氏大力设防于广陵,流民帅们则驻居于江北。建武元年(317),司马睿称晋王,晋王子司马裒代晋王太子绍镇守广陵,王导从弟王舒为司马裒的军府司马。当年司马裒离世,司马绍出镇广陵,王舒“除北中郎将、监青徐二州军事”^②。驻防广陵诸人准确领会并贯彻了司马睿的意图,流民帅们终被羁縻于江北。然而,太宁、咸和年间前后相继的王敦、苏峻之乱,使

① 田余庆:《北府兵始末》,见《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版。田先生对流民帅深层次的关注是其东晋政治研究的重大特色之一。东晋初年,流民帅确实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其出身背景不一,既有如范阳祖氏、陈留蔡氏、河南褚氏、济阴卞氏等北方高门,也有门户较低的武人,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即他们所领的部曲、乡党等长期相随,且多少经历过战事,他们的南下是由于生存的胁迫,不存在效忠东晋政权的必然性,何况有些流民帅与北方诸政权保持或多或少的联系,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正因为如此,南方政权对这些流民帅是心存顾忌的,一方面是朝廷害怕他们给孱弱的政局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另一方面率先南下在新政权中已立稳脚跟的世家大族也担心这些军事性集团的到来会抢夺自己已经拥有的地位和权益,于是羁縻政策随之产生:虚委太守、刺史、将军之号,划分大致的地盘,使其停驻于长江之外;或以军事理由促其北返,利用他们手中较强的军事力量为东晋抗击胡寇,捍卫边防。这一政策的结果便是流民帅的力量在与北方多种政治势力的较争中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东晋日后世族与皇权较争及各大世族之间攘夺的潜在利用力量。

② 《晋书》卷76《王舒传》。又《世说新语·排调》“郗司空拜北府”条注引山谦之《南徐州记》称:“旧徐州都督以东为称。晋氏南迁,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将,北府之号,自此起也。”山谦之之说或有两处失误:一是王舒领北中郎将时的北府特指广陵,而《南徐州记》中的北府则指京口;二是王舒未为徐州刺史。

这一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流民帅中的特殊人物郗鉴因卫护晋室有功,地位迅速上升,其所领势力由江北南渡,镇于京口,京口集团因此机缘终于形成。

郗鉴,高平金乡人,汉献帝御史大夫郗虑的玄孙,兖州大族。《晋书》卷六七《郗鉴传》载,郗鉴“博览经籍”,“以儒雅著名”,因此他以儒学旧族的形象出现。但他“少孤贫”,“躬耕陇亩”,说明郗氏家族在两晋之际并不显达。洛阳难后,郗鉴被宗族乡党共推为主,“举千余家俱避难于鲁之峯山”,受司马睿之命而为兖州刺史,三年之间,“众至数万”。永昌元年(322),郗鉴南下。关于郗鉴南下的情况,史籍未有明载,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所率领的宗族乡党及附近百姓必然跟随前来,亦即他是作为流民帅而被东晋政府擢用的。咸和之前,郗鉴的势力局限于江北的合肥一带。明帝太宁(323—325)年间,王敦乱起,建康危殆,于是,晋廷“谋杖鉴为外援”,而郗鉴亦“遂与帝谋灭敦”^①,王敦之乱的最终平定,与郗鉴等武力集团的相助密不可分,所以郗鉴得到了东晋政府的信重。咸和(326—334)年间苏峻、祖约坐大而兴兵,郗鉴在弭乱止叛中受命由广陵移镇京口。

京口集团的形成与发展,原因在于与司马氏皇权共天下的某个世族一旦权重,极易凭凌晋室,甚者更有移鼎之意,司马氏援引流民帅以制约世族、卫护朝廷应是顺理成章之事。而京口一带独特的战略位置则有促成之效:近可以控制晋廷的腹地三吴,以应付急需^②;远又可以与长江上游的势力相抗衡,拱卫都城建康。

概括地说,郗鉴时京口集团的势力来源有三部分:一部分是郗鉴所领的流民武装,一部分便是聚集于京口、晋陵一带的流民。前已提及,这批流民的大多数是永嘉乱后南迁的,《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南徐

① 《晋书》卷 67《郗鉴传》。

② 郗鉴领兵平苏峻之乱时,曾经指出:“今贼谋欲挟天子东入会稽,宜先立营垒,屯据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断贼粮运,然后静镇京口,清壁以待贼。贼攻城不拔,野无所掠,东道既断,粮运自绝,不过百日,必自溃矣。”(《晋书》卷 67《郗鉴传》)形势确如郗鉴所言,京口被扼后,纵掠三吴的苏峻之乱很快就被弭平。

州刺史”条所谓“过江在晋陵郡界者”主要指此类人群^①。按晋陵郡,东晋初年治京口,“旧晋陵地广人稀,且少陂渠,田多恶秽”^②,可以容纳大量流民。这些居于京口、晋陵一带的流民,显然是京口势力的重要兵源。另外一部分是依靠郗鉴的经营而获得的。晋成帝咸和四年(329),已官居司空的郗鉴从淮南之地迁不少人口于晋陵^③。徙他处流民以实京口、晋陵后,郗鉴对他们“处与田宅”,使其“渐得少安”^④。很显然,这部分人群也是京口集团势力的组成部分。

京口集团的存在,对东晋政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世说新语·捷悟》“郗司空在北府”条注引《南徐州记》云:“徐州人多劲悍,号精兵,故桓温常曰:‘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相对来说,东晋时期的政局较为稳定,除司马氏皇权与诸世族着力平衡以共存外,京口集团的制衡作用绝不可忽视。对此,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及《秦汉魏晋史探微·北府兵始末》中有过精彩的论述,此不多言。

二 东晋后期京口集团权力的转移

京口集团形成以后,屡经浮沉,其控制者多有迁转。自咸和元年(326)至太和四年(369)的43年中,掌控京口集团势力者先后有郗鉴、蔡谟、何充、桓温、褚裒、荀羨、郗昙、范汪、庾希、郗愔等人。在这期间,京口、晋陵地区基本上由郗氏家族的势力支配。太和四年,桓温借北伐之名将郗氏势力排挤出京口,并领徐、兖二州刺史,执掌京口集团。但

① 对此,陈寅恪先生认为这些次等士族避乱南来,以求保全,“以人事地形便利之故,自必觅较接近长江南岸,又地广人稀之区域,以为安居殖产之所。此种人群在当时既非占有政治之高等地位,自不能亦不必居住长江南岸新立之首都建康及其近旁。复以人数较为当时避难南来之上下两层社会阶级为多之故,又不便或不易插入江左文化士族所聚居之吴郡治所及其近旁,故不得不择一距新邦首都不甚远,而又在长江南岸较安全之京口晋陵近旁一带,此为事势所必致者也”(《述东晋王导之功业》)。

② 《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一》“润州丹阳县条”。

③ 《宋书》卷35《州郡志一》。

④ 《晋书》卷67《郗鉴传》。

恒温的专权打破了世族政治下的势力平衡,在各种力量的逼压下,很快遭到失败。孝武帝太元初年(376),谢氏家族的代表人物谢安执掌朝政,以谢玄为徐、兖二州刺史,对京口集团进行控制。此后,闻名南北的“北府兵”组成。据《晋书》卷八四《刘牢之传》:“太元初,谢玄北镇广陵,时苻坚方盛,玄多募劲勇,牢之与东海何谦、琅邪诸葛侃、乐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及晋陵孙无终等以骁猛应选。玄以牢之为参军,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资治通鉴》卷一〇四《晋纪二十六》“孝武帝太元二年”亦载:“玄募骁勇之士,得彭城刘牢之等数人。以牢之为参军,常领精锐为前锋,战无不捷,时号‘北府兵’。”胡三省注曰:“晋人谓京口为北府,谢玄破俱难等,始兼领徐州。号北府兵者,史终言之。”谢玄先以兖州刺史募得刘牢之等人,太元四年(379),加领徐州刺史,广陵、京口连为一体,始得“北府兵”之号。北府兵形成以后,成为京口集团势力的核心,所以人们又常以北府兵代指京口集团的势力。

北府兵的来源,一为原居于京口、晋陵一带的流民,包括郗鉴徙充晋陵的淮南流民,一为移于淮南的淮北流民^①。北府诸将大多来自徐、青、兖、并、扬等州,他们往往是与当地流民有紧密联系的流民帅,因此,以北府兵为核心的京口集团是武力集团的典型。与以前不同的是,北府兵的领袖人物谢玄是世族的代表,谢氏统领的京口集团是世族政治下世族执掌兵权以与皇权共天下的具体表现。它所反映的是世族政治的格局。而创建京口集团的郗鉴却是非世族的流民帅。从本质上看,京口集团的势力主要来自于流民帅及其统属的流民,是武力集团。作为流民帅的郗鉴能够折冲于东晋朝廷各种势力之间,并取得统治者的极大信任,一方面是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另一方面是出于时势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表明那时的世族政治尚处于发育期,皇权和世族都需要借助郗鉴之类的人物以为援手。而谢玄之宰制北府,则是世族政治成熟时期的表现。

^① 《晋书》卷9《孝武帝纪》:太元元年十月诏:“移淮北流人于淮南”;同书卷79《谢玄传》:“诏玄发三州人丁”。